

## 丁聪的“宫殿”

早先丁聪的家，距离婆婆家一街之隔，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去拜望是奉家长之托，自此结识了丁聪夫妇（见左图）和冯亦代、安娜夫妇。

丁聪夫妇搬到大慧寺外文局宿舍小小的两居室。我再去已经在晚辈之外又有了一层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工作关系。这个家进去时吃惊不小，“层楼叠嶂”的书桌，满是即时贴；转不开身的过道，沈峻的母亲还在，谁都没有活动的空间。当时的国情民情如此，这种几乎没有客厅的两居很普遍。但丁聪的书多，因而显得格外拥挤，对于画家来说过于局促、简陋，幸而他画的是漫画，书桌上腾出书本大的一块地方就可以了。

后来丁聪住进了昌运宫的文化文艺界当时所谓的高知楼，那时他70岁了。他说能甩开胳膊在屋子里走路了，真高兴！丁聪昌运宫的家名为四居室，总面积大约120平方米左右，不大的厨房和卫生间，没有专门的餐厅，我在折叠的饭桌上和他们一起吃过简单的午餐。

沈峻自己腌制的咸肉、雪里蕻和青菜，都是典型的上海人家的当家菜，俭朴却滋味悠长。饭桌上，沈峻得不眨眼地盯着丁聪，软硬兼施地命令诱导“吃青菜！”可她一眨眼一扭头的工夫，丁聪就会夹起白花花的



一片肥肉放进嘴里，并示威似的伸直了腰颇为得意。

丁聪、沈峻夫妇在这里度过了他们老年的安逸时光，沙发和茶几上都铺着沈峻喜欢的蓝印花布，家常而艺术。墙上挂着黄永玉的“鸟画”，画有一只鸚鵡，上题：“鸟是好鸟，就是话多！”善意调侃丁聪夫人。丁聪说是特为“家长”题的词，沈峻说：“才不是，说的是郁风。”

不大的书房是丁聪70岁之后的“宫殿”。坐在堆满书籍资料的书桌前，他那一脸的满足真让人替他高兴。

## 他怎么那么好“欺负”呢

丁聪的编制在中国美术馆，单位会不时发一箱鸡蛋或一桶食油，他拿不动了，又没有专车，总是“家长”（沈峻）骑着自行车或坐公交来取。我的工作单位与美术馆一街之隔，有很多次“家长”约我在美术馆门前

## 怀念丁聪、沈峻

·叶稚珊·

丁聪有一段时间任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我们以他的名义邀请文化界知名人士召开座谈会。来到会场，没有人拿他当领导和主持者，只当是朋友聚会，尽情说笑。我悄悄提醒他，跑题了，记录怎么整理？他苦着脸说：“我说我管不了他们你还不信，总归要你们自己再想办法了。”

小丁应该永远是那个样子，结结实实，敦厚无邪，乌黑的头发，笑眯眯。然而他真的老了，又病了，圆润的脸瘦了，说话没了底气，摔倒过两次之后，他走不了路，出不了门，最痛心的是离开了书桌，拿不动心爱的画册……合作多年的陈四益拿给他看他的亲笔画作，他说：“这个画家画得蛮好的。”沈峻守着他，护着他，推着他，直到最后一程。

## “生活始于八十五”

丁聪2009年93岁时走了。沈峻没有举行任何告别仪式，谢绝了亲友的探望，也没有给家里小丁的照片放上黑绸带。她像送不情愿上幼儿园的孩子，拍拍他，安慰道：“我们也会很快见面的。请一定等着我。”回到堆满书的家，沈峻说她觉得小丁还躲在书堆里画画。

不露声色的沈峻还是大病

一场，是肠癌，手术后昏迷很多天。但她回来了，恢复了。事后她对关心她的朋友们说是“病了一场”。病好之后，她每个星期都会给我打来电话，聊几句家常。我觉察到她是在以这种方式对开始进入漫漫辛劳伴病长途的我表达慰问、指导和关怀。她然后在电话里说：“现在自由了，我要到处玩儿去。”

岁末总能收到她自制的红色贺卡。她说：“我们的老朋友走得差不多了，他们都到另一个世界去聚会了。”“因为有你们这些好朋友的关心与照顾，我生活得非常开心。从贺卡的照片上可看出，我说的是实话。”有一张，是85岁的沈峻一身标准的滑雪服在雪山的滑雪照，上面写着：“生活始于八十五。”有一张，是86岁的沈峻全副武装在激流中漂流。还有一张，是87岁的沈峻戴红帽穿红衣，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跳跃。

2014年初，她在电话里平静地告诉我，她查出了晚期肺癌。我惊讶地问她怎么治疗。“没有好办法就算了，我不治了，到处去玩儿。”她说想去一次台湾。和丁聪一样，沈峻去世前叮嘱：什么追悼仪式都不要办，什么人都不要告诉。直到她的后事全部料理完毕，很多朋友才知道她走了。这对欢乐的夫妻团聚了，只有上天知道他们都曾经经历过多少磨难！

（摘自6月20日《北京青年报》）

20世纪80年代是通过信件交流情感、思想的黄金时代。我参加长春一个函授文学讲习班，结识了一批分布于全国各地，经历相仿、激情澎湃，刚迈开写作之步就把文学视为生命的同龄人。

讲习所的董辅文老师，我至今没见过他。他把我的习作推荐给名家评点，我至今保存有公木、徐敬亚的点评手稿。董老师不仅鼓励我，而且字也很漂亮，黑色墨水立式书写，信纸两边空格很宽，看上去不是乌黢黢一片，而是黑白有别、疏密有致，像一件书法作品。那些年，读董老师的信，成为我精神不竭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

诗坛奇人汪国真已去世好几年，偶尔想起他，还为他的聪明感叹。那时，我在一家诗歌刊物做兼职编辑，看到汪国真的自然来稿，觉得还清新，就回信于他，大意是大作暂留，有结果再告云云。于是，我俩成为笔友。

1987年秋天，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他到学院看我，并邀我去他家做客。他站在十里堡112公交车站牌下，一见面，我就感到亲切，他文质彬彬，戴副眼镜，一副学者样子。我喜欢与有文气的人交往。他大概与我有同样感觉，拉着我的手，有说不完的话。他的家（应该是他父母家）整洁、干净。他父母都在，我们一起在一张

长方形餐桌上吃了饭。吃完饭聊了会儿，他就送我去公交车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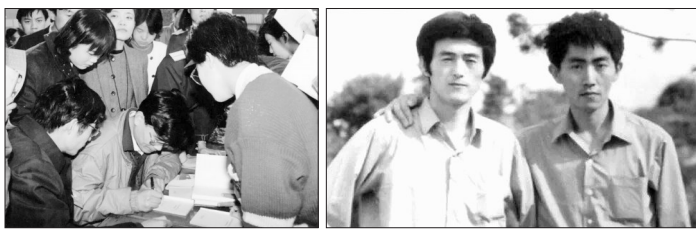
可能是喝了酒的缘故，路上他敞开心扉谈论他对诗歌的想法。就是那次，我认定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说，写诗不要长，十行二十行就行，专写励志诗。他很有心得地说，不要投大刊，就给各省青年刊物，比如《辽宁青年》《黄金时代》《山西青年》，包括你们的《新疆青年》。就发在它们的封二封三上。那些大学生、中学生，一下就能被点燃起来，你的作品能在青年当中流传，你就能在全国出名。他鼓动我，让我与他一起这样干。果不其然，没几年，他的名字大红起来。

与一个人仅一次的通信，是我人生中的一件重要事。“文革”结束不久，我不知从哪儿得到信息，北京有个叫北岛的诗人，办了一本叫《今天》的刊物，上面发表的诗歌很怪诞。我试着写去一封信，想索要那本杂志。其实也就是一试，没奢望人家会收到，或收到后搭理我。可人家就收到了，还搭理了，而且很快给我寄来了杂志。

杂志有六七本，蓝皮子的，因邮路远，有些书脊破损，蓝皮裂开，露出了里面的白色纸张。随刊物附有一信，蓝黑

## 书信故往

·秦安江·



90年代，汪国真在郑州签名售书

墨水写了大半页，大意是：《今天》现已停刊，这是最后几本，都寄给你，很高兴地处边疆的你喜欢《今天》，喜欢诗歌，望共勉。刊物纸张粗粝，字号比较大，行与行间隔也宽。是打字机打的，不是蜡版刻的，更不是铅印。

从那几本刊物上，我知道了北京有一批写诗的人，不仅是北岛，还有芒克、多多、食指、江河、杨炼，还有福建的舒婷。他们的诗歌，完全与报刊上的不一样，像从山中流出的溪水，清澈、缓慢又冷冽。

我最初与文友通信，是先打草稿，改好后再誊抄到信纸上，字迹工工整整。如写错了字，就涂上涂改液，再一笔一画写上对的字。我以为这个习惯不好，拘泥刻板，是干不了大事人的做法，想改，又积习太久。一次，我到杨牧家玩，无意中看到了他诗歌草稿本，黑色塑料封皮，16开本，一行行诗句用碳素墨水写成，豌豆大小的字工

80年代的北岛（右）与芒克

整干净，笔画也有节有致，草而不乱，飞而有根，给人感觉每一笔都不是随意为之。那天开始，我心里大感慰藉，大诗人杨牧尚且如此，我辈碌碌庸人何须纠结。

前些天整理旧物，翻到保存多年的一批信件，其中易中天的一封信，让我想起一段往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想插班就读武汉大学，插大三，两年后本科毕业。因不知招生具体事宜，就请杨牧帮忙联系在武大做中文系主任的易中天给问问。过去杨牧和易中天同在石河子莫索湾垦区，杨牧在一四八团，易中天在一五〇团，他俩曾写诗联名在报刊发表。恢复高考后，易中天去武大上学离开了新疆，杨牧则继续在团场写诗。他俩是很熟的。

易中天得知这个情况，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说，他现已不做系主任，武大招插班生有招生简章，如需

要可寄我一份。“关照”说不上，有什么问题帮忙问问是可以的。正好那年我去鲁迅文学院学习，随后就进了西北大学作家班。读武大插班生的事就放弃了。

还有一个人我不得不提起，她是陈燕妮。那是我开始诗歌写作的头两年。一天，我接到一封北京来信，短短几行大意是：我起码很喜欢你的诗，希望能与你保持联系。落款：陈弟。字迹龙飞凤舞且很硬气。一个边疆习作者，能引起京城诗歌写作者的关注，很令我感动。于是，我与这位“陈弟”便信件频繁地你来我往，谈写作，谈人生。她先是在北京一个铁路单位工作，后又调到一家报社。到报社后，每期报纸都寄我一份，她的新闻稿件、专访，她画的版面，都吸引着我。后来，我到鲁院学习，就约她见面，谁知一见面，见到的是一个漂亮女人。

她那年去的美国，我记不清了，只是每到春节，会收到她从美国寄来的贺年卡。她在纽约，先在报纸，后又到电视台。她说人在美国感到孤独，下班回来与猫为伴。有年年底，她说春节回国一定来新疆看我，但最后没来，而且失去了联系。后来，我在书店看到她的《遭遇美国》《告诉你一个真美国》等几本畅销书。从介绍看，她已在美国华人中名声大噪。

（摘自《散文》2023年第7期）